

从语法化的扩展效应看近现代以来 “非”类前缀化的过程及机制*

宁瑶瑶 王铭宇

摘要 本文借助语法化的扩展效应,考察了“非”自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生类前缀化的具体过程。研究发现:最初是受到翻译影响,在“X”与“非 X”的特定对举环境中,“非 X”始可分析为词汇性单位,“非”做词根语素;伴随“非 X”的语义-语用环境、句法环境以及“非”的同构项“X”的类型的扩展,“非”的语义不断泛化,内向依附性和能产性不断增强,最终从“词根语素”演变为“类前缀”。翻译是“非”发生类前缀化的诱因;“对举”的高频使用以及“对举项位置”的扩展是“非”类前缀化的核心环境和必要的实现手段;重新分析和类推分别是实现“非”类前缀化的首要机制和核心机制。本研究为探讨汉语类词缀的来源及形成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关键词 “非”类前缀化 语义泛化 扩展效应 对举 翻译

1. 引言

现代汉语中,“非”具有独特的形态句法功能,既可单用于句法层面,也可参与构词^①。“非”在句法中主要做否定动词^②和情态副词;否定动词“非”与上古汉语中表否定判断的“非”一脉相承,如古之“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今之“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情态副词“非”是由上古汉语中表否定判断的“非”虚化而来(参看洪波、董正存,2004;王灿龙,2008),常跟“不可、不成、不行”呼应,表示“必须”,如“你不让我去,我非去(不可)”。构词中的“非”有两类:一做词根,多见于双音节复合词,且这类复合词一般是由古汉语的否定结构或跨层结构经词汇化而来(参看董秀芳,2011:243-254),如收入《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的“非常、非礼、并非、莫非”;二做“类前缀”^③,多构成三音节及以下的词汇性单位,具极强的在线能产性,仅少量收入《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如“非金属、非处方药、非典型肺炎、非物质文化遗产”。

*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交流背景下汉语词汇学的构建与理论创新研究”(21&ZD310)的阶段性成果,亦受到澳门大学校内研究项目(MYRG2022-00120-FAH)的资助。本文修改过程中,彭睿教授及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申谢。文中倘有错谬,概由作者负责。

① 此外,“非”还见于一些习语化的固定结构,如“答非所问”“非同小可”“痛改前非”。

② 学界一般将古汉语中表否定判断的“非”称为“否定副词”,如王力(1980:352)。《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将从古汉语沿用至今表否定判断的“非”标注为“动词”,石定栩(2020)也从语义的角度将其视为“动词”。为避免不必要的歧义,本文将表否定判断的“非”统称为“表否定判断的动词”,简作“否定动词”。

③ 也有将此类“非”视为前缀的,如《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本文采用“类前缀”的说法,以区别于“老-、阿-、第-”等传统定义上的前缀。

由是观之,“非”从上古、中古到近代、现代,主要是表否定判断的“非”发生了多维度演变。其中,句法中的情态副词“非”涉及语法化,而构词词根“非”涉及词汇化,两者的相关研究也较为充分。而学界对于类前缀“非”的来源及形成问题,尚缺乏详论,主要有两种观点可参:一是译自英语的否定前缀(参看 Chao, 1968: 234-235; 杨黎黎, 2018);二是由古汉语表否定判断的“非”虚化而来(参看尹海良, 2011: 135; 万光荣, 2012),即“实词虚化”。

对于观点一的“外来说”,已有研究未见相关的词源考证,不足以判定“非”乃译自英语的否定前缀。本文就此问题做了一定的考察(详见下文)。对于观点二的“实词虚化”说,本文认为在研究理论、方法和材料上都有可完善之处。已有研究多强调“非”自身的语义发生了虚化,这在理论和方法上,体现的是语法化的“窄化效应”。彭睿(2009、2016)指出“窄化效应”以语法化项为观察对象,把语法化看作一个以紧缩和耗损为特征的减量(decrease)过程,包括语法化项语音和语义内容的弱化及其与其他成分关系的受限。事实上,“非”与其他成分结合并不受限,反而十分能产。因此,单从“窄化效应”来考察类前缀“非”的形成,似有不足之处。

近年来,以 Himmelmann(2004)提出的“基于环境的语法化观(the context-based view on grammaticalization)”为代表,不少学者主张从语法化项及其所在环境的共变(co-evolution)关系来考察语法化过程,将语法化定义为三个层次的环境扩展(context expansion; 参看 Himmelmann, 2004: 32-33; 彭睿, 2020: 12-13),且“语义-语用环境扩展”是语法化的核心特征,如下所示:

1) 语义-语用环境扩展,即语法化项所在结构可出现在语法化项变化发生之前所不能出现的更大环境中,如英语中“指示代词+名词”只能出现于有上下文或前指成分的环境中,而“冠词+名词”则不拘于此;

2) 句法环境扩展,即语法化项所在结构能出现的句法环境从核心论元(主语或宾语)扩展到它不曾出现过的其他句法环境,如介词短语中;

3) 同构项类型扩展,即能与语法化项构成组合关系的成分类型的增加。

彭睿(2009、2016)把这种关注“语法化项及其所在环境”扩展的语法化,称作扩展效应。因此,欲弄清“非”类前缀化的过程,将观察对象从“非”自身转向“非”及其所在环境或可成为深化“非”类前缀化研究的新路径。

有了研究路径还要有合适的材料。以往研究所据材料,存在明显的时间断层。据《近现代汉语辞源》,表新概念的多音节“非 X”最早产生于 19 世纪中叶,故 19 世纪中叶大率是“非”古今联系的重要阶段,而这一阶段恰恰为以往研究所忽视。由“非”构成的新概念名词(又称“新名词”^④)常见诸汉译西书、报刊杂志和汉外外汉辞书。因此,本文利用《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1850—1949)^⑤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数位馆藏资料库》^⑥穷尽式考察“非”自 19 世

^④ 近现代“新名词”指产生于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的汉语新词,主要包括反映新概念、新知识的抽象词汇和学术用语(参看沈国威, 2008)。

^⑤ 《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https://www-neohytung-com.libeproxy.um.edu.mo>)涵盖 1850—1949 年间的两万五千种报刊资料,包括《遐迩贯珍》《六合丛谈》《格致汇编》《顺天时报》《大公报》《益世报》《北洋画报》《上海新报》《申报》等传播新知识的近现代重要报刊。全库内容持续修订增补,种类动态添加,本文通过该库收集的“非 X”语料时间截至 2020 年底。

^⑥ 该资料库涵盖了大量 19 世纪以来日本近代“日译西书”“日译汉书”以及中国近代“汉译西书”,其中很多的“汉译西书”是《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未能涵盖的。

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的用法,整理出三音节及以上的词汇性单位“非 X”801 例(首见书证计为 1 例);除此之外,本文还利用北京大学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穷尽式考察“非”自 20 世纪中叶至今的用法,整理出三音节及以上的词汇性单位“非 X”1020 例^⑦。语料的时间跨度超过一个半世纪。

出于操作上的考虑,本文对“词”和“短语”的判定,一律采用句法标准(这与 Packard (2000)、董秀芳(2016)的处理一致),即若一个形式在句法中充当一个最小的自由单位,能够以整体不可分割的方式进入句法中的一个空位或句法树的一个终端节点,此形式为“词”。具体来说,本文将语料中不带“之/的”的黏合式定中结构看作名词性复合词(下文用“N”表示),将带“之/的”的组合式定中结构看作名词性短语(下文用“NP”表示)(参看朱德熙,1982:148;石定栩,2003),如将“金属物质”“国际民航公约缔约国”视为“N”,“俄国式之革命”“正义的战争”视为“NP”。

下文将基于 1800 余条有效语料,藉助语法化扩展效应的观察视角,分阶段考察“非”及其所在环境的共变,以廓清“非”类前缀化的过程,进而探讨“非”类前缀化的机制等问题。

2. “非”类前缀化的过程

根据“非”及其所在环境扩展的阶段特征,本文分以下四个阶段详细描写“非”类前缀化的具体过程。

2.1 19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

直至 19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非”在汉语书面语中仍主要做否定动词,用于“S 非 X”和“SV 非 X”两种句式,表否定判断,义为“不是”。“非”的同构项是“X”,“X”可为名词、名词性短语及小句,如:

- (1) 所见者乃日之影,非日也。(《六合丛谈》1857)
- (2) 今之陆地,有山、有谷、有壑、有野、有河湖,然非昔数千年之陆地也。(《六合丛谈》1857)
- (3) 涨退四次者,此非由日月吸引所生,盖潮水一线横流。(《六合丛谈》1857)
- (4) 已上所载之杂报,乃据一友人自清远而来者所录,虽则颇失次序,谅非虚言,故特收入贯珍。(《遐迹贯珍》1855)
- (5) 娑格拉底斯云,人之知觉,有为耳目口鼻所引者,亦有非耳目口鼻之功,即己所自有之良知是也。(《六合丛谈》1857)
- (6) 若诸山濒东海,则地面太热而无雨,物不能生,一洲皆成废土,谓非上帝措置,而能若是乎。(《六合丛谈》1857)

上例(1)-(3)中,“非 X”在“S 非 X”句中充当谓语^⑧;例(4)-(6)中,“非 X”在“SV 非 X”句中充当“V”的宾语。尽管“非 X”在两种句式中的句法功能不同,但性质相同,均可看作“否定性句法结构”^⑨,凸显“陈述(否定判断)”的语用功能,义为“不是 X”。

而彼时正值西学兴起,在英国传教士慕维廉撰写的中文报刊文章《六合丛谈·地理篇》

^⑦ 在语料整理时,由于《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是由图片扫描生成的电子文本,且原文大多无标点,只能输入“非”逐个检索,再将检索到的结果以句段形式、按时间先后排列,接着逐一与原文影像核对;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则直接通过检索式检索,再做去重及核对。

^⑧ 这里的“谓语”指除主语外其他必需成分的总和,参看《现代语言学词典》(第四版,商务印书馆)。

^⑨ 本文的“否定性句法结构”指由表否定判断的动词“非”与名词性成分、小句构成的否定结构。

(1857)中,首见1例与西学新概念相关的“非X”——“非金类”。“非”的同构项始见“新名词”——“金类”^⑩,如:

(7) 历从来,亦知世间元质共六十二,其中四十九为金类,十三非金类,皆有定法。(《六合丛谈》1857)

例(7)中的“非金类”仍是一个否定性句法结构^⑪，“十三非金类”仅可理解为“十三(种)不是金类”。这份材料是否有英文原文,无从知晓,只能根据汉语的文意来理解。但这至少能说明,此时的“非金类”还不是词汇性单位,“非”还做否定动词。

2.2 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19世纪70年代初,“非X”初见于汉译西书——美国传教士嘉约翰口译、国人何瞭然笔述的《化学初阶》(1870)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口译、国人徐寿笔述的《化学鉴原》(1871),二者均译自同一化学原著 Wells 的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Chemistry* (1858)的无机化学部分。汉译和原文对照如下:

(8) a. 原质统分二等,一金之类,一非金之类。原质内金类比非金之类尤多,但非金之类随在皆有也。(《化学初阶》1870)

b. 原质分为两类,一为金类,一为非金类。金类之品虽多于非金类,然万物以非金类化成者,乃多于金类。(《化学鉴原》1871)

c. The elements are usually divided into two great classes, the metallic and non-metallic substances or the Metals and the Metalloids. The substances comprised in the first class are the more, numerous but those in the latter are the more abundantly distributed.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Chemistry* 1858)

(9) a. 原质统分二等,一金之类,一非金之类。(《化学初阶》1870)

b. 原质有金类之性者,有非金类之性者。(《化学鉴原》1871)

c. The generally recognized division of the simple substances into Metallic and Non-metallic elements, or the Metals and Metalloid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Chemistry* 1858)

上例(8)(9)中,“非金之类”“非金类”“非金类之性”均非严格对译“non-metallic substances/elements”(今译“非金属物质/元素”),而只是基于原文大意的意译^⑫。“非金”这个字串似乎译自“non-metallic”,“非”似乎译自“non-”。但在实际语境中,“非”的性质要么还很模糊,要么须依靠特定的环境才能判定。如上例(8a)(9a)(9b)中的“非金之类”“非金类之性”,“非”到底可看作否定动词,还是词根语素,抑或两可,均无法定论;或者如上例(8b)中的“非金类”,因处于宾语位置且与“金类”对举,我们方可将它判定为词汇性单位,“非”视为词根语素。这说明,“非”并不是严格对译“non-”,只是对译了“non-”的语义,并未完全借入“non-”的词法功能。因此,我们只能说,翻译(西学汉译)是“非”类前缀化的诱因^⑬而非实现

^⑩ “金类”(今“金属”)是创制于近现代的化学术语,指具有光泽、延展性、容易导电、传热等性质的物质,如金、银、铜、铁、锰、锌(参看《近现代汉语辞源》)。

^⑪ 《近现代汉语辞源》将“非金类”收作词条,其首例书证即为例(7)中的句子。

^⑫ 这与早期汉译西书多由西人口述、国人笔述不无关系。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曾撰写《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1880)一文,文中提到:“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

^⑬ 此外,本文还排除了汉语词汇性单位“非X”最初借自日语的可能性。经考察发现,日语中首例词汇性单位“非X”也是“非金类”,见于美国传教士嘉约翰原译、日本清原道彦译的《原素略解:化学示蒙》(1873)中的“原素ハ總テ二等二分ツ、一ハ金類、一ハ非金類ニシテ、金類ハ非金類ヨリ尤モ多シ”,晚出于汉语。

手段。

但这一阶段,“非”迈出类前缀化至关重要的一步,即在特定的对举环境中,“非 X”始可识解为词汇性单位,“非”可视为词根语素。这是“非”类前缀化的必要和初始条件。这一阶段,“非 X”仅见“非金类”(例频 20 例)。

2.3 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初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非 X”始现于近代报刊中,所涉概念领域从最初的化学扩展至政治、经济、军事。语境中“X”与“非 X”对举更加显著,且对举项“X”与“非 X”分别或同时居于主语或宾语(核心论元)位置,“非 X”更易看作词汇性单位,“非”更易看作词根语素,如:

- (10) 凡原质与杂质,金类与非金类,千变万化,为用无涯。(《湘报》1898)
- (11) 美国子民在中国做工,不论有本无本,与在通商口岸及非通商口岸,不论何处,照立和约限两月之外。(《申报》1894)
- (12) 方是时也,议院分为二派,曰政府党,曰非政府党。(《新民丛报》1902)
- (13) 昨已拟定表式札发宁镇各标营,填注战斗员(军佐)若干人,非战斗员(军佐)若干人,目兵若干人,以便汇合支配。(《申报》1908)

上例(10)–(13)中的“非金类”“非通商口岸”“非政府党”“非战斗员”要么充当主语,要么充当宾语,分别用于指称与“金类”“通商口岸”“政府党”“战斗员”相对立的概念。因此,“非 X”凸显“指称”功能,是名词性的词汇性单位,“非”做词根语素;“非”的功能是通过否定某物所属类别,来对事物进行分类命名,义为“不属于(某物所属类别)”。所谓“类别”,现阶段主要包括“成分”“功能”和“形式”类别。如“非金类”通过“非”否定金、银、铜、铁、锰、锌等所属“金类”的成分类别,来指称“不属于金类的其他原质”;“非通商口岸”通过“非”否定“口岸”所属“通商”的功能类别,来指称“不具有通商功能的其他口岸”;“非政府党”通过“非”否定“党派”所属“政府主导”的形式类别,来指称“不属于政府主导的其他党派”。在这一阶段,“非”的同构项“X”均为类指名词(“N”),且“N”的音节数为双音节、三音节和四音节,如上例(10)–(13)中的“金类”“政府党”“战斗员”“通商口岸”。并且,“非 N”的类型频率迅速上升,新增 35 类^⑭,“非”作为词根语素的能产性逐步增强。

2.4 20 世纪 10 年代至今

20 世纪 10 年代至 40 年代,“非 X”所涉概念领域扩展至社会生活。语境中对举项“X”与“非 X”的位置不只是主语、宾语(核心论元)位置,而是呈阶段性扩展。伴随对举项“X”与“非 X”所居位置的扩展,“非 X”的语义-语用环境、句法环境及“非”的同构项类型同步扩展。“非 X”做词汇性单位,“非”做词根语素已是常态。自 20 世纪 50 年代始,“非”逐渐具备了“类前缀”的功能。

2.4.1 第一阶段(20 世纪 10 年代)

语境中对举项“X”与“非 X”的位置扩展至核心论元的修饰成分位置——说明性定语位置,既可分别对举于[[X]之 N]与[[非 X]之 N],也可同时对举于[[X]与[非 X]之 N],“非”作为词根语素,内向依附性进一步增强,如:

- (14) 此外,各金类之价莫不增高,平均是年铜价每匹克尔日金六十六元零九分……非金类之矿物价亦

^⑭ “类型频率”的单位用“类”表示。下同。“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初”和“20 世纪 10 年代至今”两个时期中“非”的同构项类型及其对应的部分实例详见附录。

大涨,惟硫黄为例外。(《申报》1918)

- (15) 故不惜重资延聘化学专门家,于研究各厂原药香料化学器具之暇,专化验矿物内之铋质锰质以及钾钠错镁,金类与非金类之各种杂质。(《申报》1915)

例(14)中,“非金类之矿物价”的结构为[[非金类]之[矿物价]],指“不属于金类这个类别的其他矿物的价格”;例(15)中,“金类与非金类之各种杂质”可解析为“金类之各种杂质”与“非金类之各种杂质”,后者的结构为[[非金类]之[各种杂质]],指“不属于金类这个类别的其他各种杂质”。此二例中的“非金类”均充当组合式定中结构的说明性定语,与中心语之间的语义关系均是“领有关系”,但“非金类”仍是名词性词汇性单位。也即“非X”的功能仍表“指称”,义为“不属于(某物所属类别)”。这一阶段,不论“非X”居于核心论元位置,还是居于说明性定语位置,“非”的同构项仍均为类指名词(“N”),但音节数扩展至四音节以上,如:

- (16) 除现任左院议员者外,不在此限。英苏贵族,绝对的受此制限。惟爱尔兰贵族,非现任左院议员者,则有被选权。(《国风报》1910)
- (17) 此次让地乃出于日耳曼各党之促迫,奥国日耳曼民族与非日耳曼民族之感情,必将因以愈恶。(《申报》1918)

而且,“非N”的类型频率急剧上升,新增194类之多,也即“非”作为词根语素的能产性显著增强。

2.4.2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语境中对举项“X”与“非X”的位置扩展至核心论元的限定成分位置——限定性定语位置,仅限同时对举于[[X]与[非X]N],“非”作为词根语素的内向依附性继续增强,如:

- (18) 氟易与一切金属或非金属物质化合。(《申报》1921)
- (19) 前偕其夫人搭新丰轮抵沪,办理苏沪一切诉讼及非诉讼事宜。(《申报》1928)
- (20) 第四届联美商务会议,明日在此间开幕,南北美各国正式与非正式代表,刻正联袂而至。(《申报》1931)

例(18)中,“金属或非金属物质”可解析为“金属物质”与“非金属物质”,“非金属物质”的结构为[[非金属][物质]],“非金属”充当黏合式定中结构的限定性定语,例(19)(20)可同此分析。除“非金属物质”的语义关系仍为“领有关系”,“非金属”为名词性词汇性单位外,“非诉讼事宜”“非正式代表”的语义关系均为“属性关系”,分别指“不具有诉讼性质的事宜”“不具有正常性质的问题”。“非诉讼”“非正式”凸显“属性”的功能,类似“属性词”^⑮。因此,“非X”的功能扩展至表“属性”,“非”仍做词根语素,但其功能扩展为通过否定某种属性来对事物进行分类,即“区别名物”,义为“不具有(某种属性)”。另外,就名词性词汇性单位“非X”而言,“非”否定某物所属的类别扩展至“来源”类别,如下例(21)的“非婚生子女”,其通过“非”否定子女所属“婚生”的来源类别,来指称“不属于婚生来源的其他子女”。

- (21) 法律为人道及社会利益计。自不应因父母所为不法,而于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间存歧异之态度。(《法令周刊》1932)

这一阶段,“非”的同构项“X”发生两类扩展:一是居于核心论元位置的“非X”中,“非”的同构项“X”发生同质扩展,从类指名词(“N”)扩展至名词性短语(“NP”),如:

^⑮ “属性词”又称“区别词”“非谓形容词”,主要做定语,黏附在名词或助词“的”前,是一个黏着词,以区别名物,具有分类、命名的作用(参看吕叔湘、饶长溶,1981)。

(22) 故所谓会议制之争者,简言之,则俄国式之革命与非俄国式之革命是也。(《解放与改造》1921)

(23) 忽视这种区别,就等于忽视中国的抗战是解放战争,是革命战争的性质,就等于忽视正义的战争与非正义的战争之间的天渊的区别。(《申报》1939)

二是居于组合式和黏合式定中结构定语位置的“非 X”中,“非”的同构项“X”发生异质扩展,从类指名词扩展至双音节动词、形容词,如上例(19)中的动词“诉讼”和上例(20)中的形容词“正式”。“非 N”的类型频率呈爆发式增长,新增 500 例;“非 NP”和“非 V/A”的类型频率均较低。总的来说,“非”作为词根语素的能产性持续增强。

2.4.3 第三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始,“非”所涉及的三个环境无新扩展,仅“非”的同构项“N”“NP”“V”“A”各自的类型频率持续增长,且“非 N”的类型频率增幅最高(达 877 类)。可见,“非”的同构项类型自始至终以“N”为主导。这时,尽管新的词汇性单位“非 X”的产生仍主要借助“X”与“非 X”的对举,但“非”作为词根语素,其定位性、内向依附性、能产性及语义泛化的特点已稳定下来。也即,在人们的心理词库中,“非”逐渐具备了“类前缀”的词法功能。^⑩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人们更多地接触外语,百科知识的增强,“非”作为类前缀的功能得到更多强化。

另外,有些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出现的单个词汇性单位“非 X”,经大量对举、高频使用后,其所表达的概念已为人熟知,可无须借助对举而单独出现,少量甚至进一步发生“词化/单词化”^⑪,作为名词或属性词收入词典^⑫。这种情况在本阶段之后已较为常见。以“非金属”“非正式”为例,两者最早均见于须对举的语境中,如:

(24) 金属为最易传导之物,故谓之电气的良导体。此外,非金属为不良导体者居多。(《湖北学生界》1903)

(25) 其名氏已由日政府之正式与非正式代表,开单送交北京政府请求逮捕。(《申报》1920)

但二者在本阶段有大量可单独出现而无须对举的用例,如:

(26) 编织厂是个非金属生产的小单位,没有什么废钢铁可回收。(《人民日报》1970)

(27) 约翰逊在白宫举行的这个“非正式”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已经要求麦克纳马拉在参加了北大西洋集团部长理事会巴黎会议以后到西贡去。(《人民日报》1963)

2.5 小结

综上所述,在 19 世纪 70 年代,“非 X”最初受到翻译的影响,在特定的对举语境中,始可分

^⑩ 相关心理语言学实证研究也表明,三音节及以上词汇性单位“非 X”中的“非”具有显著的“类前缀”的心理表征(参看宁瑶瑶等,2022)。

^⑪ 一个结构性词汇成分向一个典型的汉语单词(word)的演变,又称“词化/单词化”(参看李宗江,2017:14-17)。

^⑫ 本文统计《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等 5 部词典,发现共收入名词“非 X”33 例:非金属、非晶体、非卖品、非正规战、非全日工、非主谓句、非电解质、非织造布、非处方药、非常规能源、非典型肺炎、非官守议员、非极性分子、非晶态合金、非企业法人、非手术疗法、非条件反射、非对称作战、非婚生子女、非接触作战、非致命武器、非选区议员、非再生资源、非正义战争、非政府组织、非执行董事、非制服人员、非主要矛盾、非对抗性矛盾、非公有制经济、非传统安全威胁、非再生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收入属性词“非 X”4 例:非正式、非官方、非职务、非农(“非农业”的简称)。经逐一回查《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和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我们发现这些“非 X”词例在产生之初无一例外均出现于对举语境。也就是说,它们均是经“对举-高频使用-词化”后作为词条收入词典的。

析为词汇性单位,“非”做词根语素。这是“非”类前缀化的关键,也是“非”类前缀化的开端。随后,伴随“非”所涉三个环境的扩展,“非”逐步发生类前缀化。“非”所涉三个环境的扩展过程如下:

- 1) “非 X”语义-语用环境的扩展:
“X”与“非 X”对举位置;核心论元位置>定语位置
- 2) “非 X”句法环境的扩展:
充当主语、宾语>充当定语
- 3) “非”同构项“X”的类型扩展:
 - a. 异质扩展:类指名词>名词性短语、动词、形容词
 - b. 同质扩展:双、三、四音节类指名词>多音节类指名词

简言之,伴随着“非 X”语义-语用环境的扩展,“非”的语义发生了从表示“不属于(某物所属类别)>不具有(某物具有的属性)”的扩展。其中,所属“类别”涉及“成分”“功能”“形式”及“来源”类别。而“非”义为“不属于”表示完全否定,义为“不具有”表示部分否定。所以“非”语义的扩展过程,即是“非”否定的语义辖域缩小,“非”语义泛化的过程。伴随“非 X”句法环境以及“非”同构项“X”的类型的扩展,“非”自身的内向依附性及能产性不断增强。最终,“非”实现了从“词根语素>类前缀”的演变。这一过程中,语义-语用环境中对举位置的扩展是核心特征,句法环境及同构项的扩展是附带特征(by-product)。

3. “非”类前缀化的机制

综观“非”类前缀化的过程,“非”类前缀化的机制主要涉及重新分析和类推。其中,重新分析是首要机制,促使“非”的内向依附性增强以及语义泛化;类推是核心机制,促使“非”的能产性增强。

重新分析的主要功能是改变底层形式,创造新规则,产生组合性变化(参看 Hopper 和 Traugott, 2003:50-63)。“非 X”原本是一个否定性句法结构,因位于主语或宾语位置,且与“X”对举,“非 X”在心理上就形成了一个组块(chunk),其内部结构边界消失,可重新分析为名词性词汇性单位,“非”开始具有内向依附性。此时,“非”的功能不再是“否定判断”(义为“不是”),而是通过否定某物所属类别,来对事物进行“分类命名”,须解读为“不属于(某物所属类别)”。之后,当“X”与“非 X”的对举位置处于黏合式定中结构的定语位置时,“非 X”的性质类似“属性词”。此时,“非”的内向依附性增强;“非”的功能须重新分析为否定(某种属性),义为“不具有(某种属性)”。而“非”的语义从“不属于>不具有”的演化,便是语义泛化的过程。

类推的主要功能是改变表层形式,推广新规则,产生聚合性变化(参看 Hopper 和 Traugott, 2003:63-79)。因语境中“X”与“非 X”对举,“非 X”不仅形式上形成一个组块,语义上也形成一个与“X”相对立的组块,也即“X”与“非 X”可视为一对极性反义词。这样一来,“非 X”便获得了对“X”以外事物“临时分类”的功能,这种简单、经济的分类方法是“非 X”类推的认知基础,“非”的同构项“X”同质和异质扩展以及“非 X”类型频率的增加均是类推的结果。

由下页表 1 可见,从 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初始,“非”同构项“X”的类型便迅速扩展,且“非 X”的类型频率增幅越来越大,这充分显示了“非”的能产性持续增强。

表1 “非”同构项的类型及类频(用数字表示)

类型	时期				
	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	20世纪10年代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20世纪50年代至今
[非 N _双]	1	19	53	114	296
[非 N _三]	0	6	58	123	157
[非 N _四]	0	10	70	199	270
[非 N _多] ^⑩	0	0	13	64	154
[非 NP]	0	0	0	38	51
[非 V _双]	0	0	0	17	48
[非 A _双]	0	0	0	14	44
合计	1	35	194	569	1020

4. 结论

本文发现,类前缀“非”并不是在汉语内部自然发生的实词虚化的结果,亦非直接译自英语否定前缀。事实上,受到翻译的影响在特定的“对举”语境中,否定动词“非”始被分析为“词根语素”,并依赖其所在环境的扩展,最终实现了从“词根语素>类前缀”的演变。“对举”是“非”类前缀化的初始条件,而“对举”的高频使用及“对举位置”的扩展既是“非”类前缀化的核心条件,也是“非”类前缀化得以实现的必须手段。可见,“对举”不仅是汉语的一种修辞手段、语法手段和造词手段(参看张国宪,1993;刘云,2006),还是一种实现类前缀化(语法化)的有效手段。倘如以往研究基于实词虚化(语法化的“窄化效应”),仅关注“非”自身形态、语音、语义等特征的变化,忽略其所在环境,就很难发现“对举”在“非”的类前缀化过程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本文还注意到,“非”的类前缀化是在浅文理(文白夹杂)的书面语体中完成的,而不是在口语(白话)语体中完成的,这与彼时中西语言接触渐深、新概念传播的载体(翻译著作、报刊、杂志和辞书)密切相关。所以说,恰切的理论方法和材料,对于“非”的类前缀化研究来说缺一不可。

此外,“对举”不仅是考察“非”类前缀化的有效手段,还可为多音节“非 X”的结构切分提供新的依据。学界对多音节“非 X”的结构切分一直存有争议,以“非公有制企业”为例。已有研究均认为“非公有制企业”只可能有一种结构切分,非此即彼:或是[[非][公有制企业]](参看崔婷,2009;李刚,2011),或是[[非公有制][企业]](参看吕叔湘,2019;石定栩,2020;齐冲、张未然,2020)。而本文认为,根据语境中对举项的不同,“非公有制企业”的结构本就可有两种分析,如:

(28) 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市场活动的人。
(《人民日报》1996)

(29) 林国强代表说,在南宁很多行业都是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共同介入。(《人民日报》2003)

在上例(28)中,对举项为“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的结构为[[非][公有制企业]];在上例(29)中,对举项为“公有制”与“非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的结构为[[非公有制][企业]]。因此,要明确此类“非 X”的结构分析,不可脱离具体的语境。

^⑩ 本文将四音节以上的“N”标为“N_多”。

若语境中此类“非 X”不涉及对举,两种结构切分皆可,因它们在语义上几乎等价。另外,“对举”还体现在“非 X”的词典释义中,用以增强读者对“非 X”的语义理解,如“非传统安全威胁”在《新华新词语词典》中的释义专门标注了“相对于‘传统安全威胁’”。

本研究还有助于厘清“非 N/A/V”类属性词的产生途径。有的“非 N/A/V”类属性词是因在[[非 N₁/A/V][N₂]]中高频使用而发生了词化,是从[[非 N₁/A/V][N₂]]中整体切分出来的,而并不是都如吕叔湘、饶长溶(1981)、李宇明(1996)所指直接在“N/A/V”前加“非”构词而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非”还称不上是典型的类词缀。“类词缀”这个概念来自形态丰富的印欧语,由现成的“派生”构词模式分析得出,具定位性、能产性及语义泛化的构词特点,且黏附的单位是“词根”,如英语类词缀“-free”(sugar-free)、“-man”(superman);而类前缀“非”是在“X”与“非 X”的“对举”扩展中逐步分析、强化后,才具有了定位性、能产性及语义泛化的构词特点,且“非”黏附的单位是“词”或“短语”,如“非(金属)”“非(俄国式之革命)”。同时,从演变过程看,印欧语的“类词缀”位于“词根(root)>类词缀(affixoid)>派生词缀(derivation affix)>屈折词缀(inflexional affix)”语法化进程的第二阶段(Stevens, 2005),即类词缀是从复合词中的词根语法化而来;而汉语类前缀“非”的语法化路径是“词根语素>类前缀”。这虽与印欧语从词根演变为类词缀的过程异曲同工,但后者须借助“对举”方可实现。本文基于以上分析认为,将“非”认定为“类前缀”更为妥当,而不应再将其与“前缀”或“词根”混为一谈。

附录

限于篇幅,附录胪列“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和“20世纪10年代至今”两个时期中不同“非 X”类型的实例,所举实例均出现于“X”与“非 X”对举的上下文语境中。例子下脚标的汉字表示“同构项的音节数”。

一、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

[非 N](35类)

a. [非 N_双](19类):非金属、非官品、非正途、非政党、非生物、非战员、非党员、非卖品、非晶质、非会员、非军人、非军官、非股东、非官僚、非教徒、非党派、非道德、非奴隶、非讼事

b. [非 N_三](6类):非政府党、非社会党、非民主国、非现行犯、非战斗员、非政府派

c. [非 N_四](10类):非正途人员、非金类质物、非通商口岸、非帝国主义、非政党内阁、非利益主义、非军事铁路、非民族主义、非中央集权、非个人主义

二、20世纪10年代至今

(一) 20世纪10年代

[非 N](194类)

a. [非 N_双](53类):非疫区、非外债、非职员、非教员、非商界、非禁品、非租界、非军阀、非耕地、非官员、非革命

b. [非 N_三](58类):非宪政馆、非国会议员、非文明国、非共和派、非必需品、非基督徒、非政学派、非道德家、非运动员、非审查员、非亲告罪、非亲德派、非政治犯

c. [非 N_四](70类):非金属矿物、非课税单位、非武装商船、非现任教员、非会员出品、非教会学校、非秘密结社、非军人军属、非现在议员、非行政诉讼、非耶稣教徒

d. [非 N_多](13类):非日耳曼民族、非社会党议员、非现任警职者、非会员往送者、非师范出身者、非贤母良妻派、非欧洲大陆政党、非紧急军事运输、非本科毕业生、非陆军军人军属、非现任左院议员

(二)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非 N](500类)

a. [非 N_双](114类):非导体、非医界、非宗教、非国货、非赠品、非商会、非科学、非变式、非基督、非民党、非人类、非民国、非商船、非常识、非演员、非学生、非队员、非案犯、非工人

b. [非 N_三](123类):非劳动者、非元勋派、非教育者、非需要品、非会员国、非产米区、非知识界、非金属矿、非宗教界、非奢侈品、非现行罪、非职业党、非专门家、非生物性、非出品人、非签字国

c. [非 N_四](199类):非国际机关、非秘密会议、非营利事业、非国会议员、非共产主义、非反对方、非诉讼行为、非金属材料、非科学知识、非机动车辆、非知识阶级、非官方人士、非婚生子女、非金属光泽

d. [非 N_多](64类):非联合会会员、非共产党党员、非专门哲学家、非纯正混合裁判、非现代团体生活、非无产阶级青年、非国防工业资本、非士大夫阶级出身、非国际民航公约缔约国

[非 NP](38类):非俄国式之革命、非完全华人国籍之团体、非现代的国家、非正义的战争、非共产派的党员、非武装的忠实同志、非资本主义的前途、非资本主义的剩余劳动

[非 V](17类):非挂号、非在学、非登记、非联运、非配给、非营利、非统制、非占领、非诉讼、非演习、非灌溉、非自给、非推荐、非自耕、非消费、非限额、非管理

[非 A](14类):非正式、非军用、非主要、非正义、非现役、非危险、非公开、非业余、非现任、非正常、非露天、非重要

(三) 20世纪50年代至今

[非 N](877类)

a. [非 N_双](296类):非北约、非足联、非主流、非主权、非职务、非住宅、非灾区、非国企、非邮政、非艺术、非医疗、非病毒、非处方、非船舶、非传统、非贷款、非法人、非关税、非G股

b. [非 N_三](157类):非超高压、非成员国、非处方药、非缔约方、非对抗性、非感染者、非工程菌、非共价键、非金融业、非经济界、非耐用品、非欧佩克、非契约说、非全日制、非热效应、非食物类、非市场化

c. [非 N_四](270类):非主要矛盾、非正式组织、非流动资产、非财政措施、非医疗事故、非重点学校、非主权行为、非上市债券、非货币收益、非营利法人、非关税保护、非流通股、非滞销产品、非自动词

d. [非 N_多](154类):非流媒体课程、非结构化决策、非程序性决策、非开放性条约、非病原微生物、非极性化合物、非暴力政治斗争、非典型担保物权、非自然垄断领域、非人寿保险公司、非安理会成员国、非传统安全因素、非特异性传入系统、非经营性国有资产

[非 NP](51类):非历史的思维方式、非诉讼上的申诉权、非国有资产的评估、非循序渐进的方法、非真正的作家、非劳动的办法、非人为的因素、非历史的做法、非人力的力量、非理智的形象、非哲学的材料

[非 V](48类):非配套、非居住、非统计、非在职、非转让、非再生、非执业、非接触、非对抗、非限定、非上市、非国有、非承重、非试验、非垄断、非自主、非麻醉、非持续

[非 A](44类):非国立、非耐用、非直接、非宏观、非对称、非有机、非健康、非均衡、非熟练、非正规

参考文献

崔 婷 2009 《现代汉语“非+X”结构研究》，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戴维·克里斯特尔(编) 2018 《现代语言学词典》(第四版)，沈家焯译，商务印书馆。

董秀芳 2011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董秀芳 2016 《汉语的词库与词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傅兰雅 1880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6-9月。

洪 波 董正存 2004 《“非X不可”格式的历史演化和语法化》，《中国语文》第3期。

黄河清(编著) 2020 《近现代汉语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

李 刚 2011 《现代汉语类词缀“非、准、性、化、家”的发展演变与特点》，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李宇明 1996 《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中国语文》第1期。

李宗江 2017 《语法化与汉语实词虚化》，学林出版社。

刘 云 2006 《现代汉语中的对举现象及其作用》，《汉语学报》第4期。

- 吕叔湘(主编) 201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饶长溶 1981 《试论非谓形容词》,《中国语文》第2期。
- 宁瑶瑶 王涵 高飞 王铭宇 2022 《汉语多音节词汇单位“非XY”的心理表征及加工机制——来自行为及ERP的证据》,“《外国语》第五届语言学青年学者论坛”会议论文。
- 彭睿 2009 《语法化“扩展”效应及相关理论问题》,《汉语学报》第1期。
- 彭睿 2016 《语法化·历时构式语法·构式化——历时形态句法理论方法的演进》,《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彭睿 2020 《语法化理论的汉语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
- 齐冲 张未然 2020 《汉语前加否定成分“不、非、无、零”》,《华文教学与研究》第4期。
- 石定栩 2003 《汉语的定中关系动-名复合词》,《中国语文》第6期。
- 石定栩 2020 《复合词的结构与汉语语法的最小单位——兼论“非、后、化”的句法地位》,《汉语学报》第4期。
-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写) 2003 《新华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 沈国威 2008 《汉语的近代新词与中日词汇交流——兼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
- 王光荣 2012 《前缀式“非+X”研究》,《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王灿龙 2008 《“非VP不可”句式“不可”的隐现——兼谈“非”的虚化》,《中国语文》第2期。
- 王力 1980 《汉语史稿》(修订本),中华书局。
- 杨黎黎 2018 《汉语商品名称中的派生式构词:否定性词缀、类词缀和动语素》,《学术交流》第2期。
- 尹海良 2011 《现代汉语类词缀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 张国宪 1993 《论对举格式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2016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immelmann, Nikolaus P. 2004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pposite or orthogonal? In Walter Bisang, Nikolaus P. Himmelmann and Björn Wiemer (eds.), *What Makes Grammaticalization? —A Look from its Fringes and its Components*, 19–40.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ckard, Jerome L. 2000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evens, Christopher M. 2005 Revisiting the affixoid debate: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word. In Torsten Leuschner, Tanja Mortelmans and Sarah De Groot (eds.), *Grammat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71–83.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 Wells, David A. 1859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Chemistry*. New York: Ivison & Phinney.

宁瑶瑶 南宁 广西大学文学院 ningyaoyao@gxu.edu.cn;
王铭宇 澳门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mywang@um.edu.mo

theory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Cx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exicalization and morphologicalization of such compounds and finds that metaphorical compounds have evolved through different paths with mechanisms of fusion, coercion and reanalysis. All three paths arrive at the same end and their cognitive strategies include both partial metaphor and metaphor mapping event as a whole. Since metaphorical compounds shows a declining trend in morphologica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conditions that may affect their formation and the restrictions caused by disyllabification or complication of N and V. Furthermore, the productivity of metaphorical compound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restraints are also discussed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NV compound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not only to resolve relevant controversies in current studies but also to provide a new approach in lexical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orm and meaning, lexicalization and morphologicalization, word-creation and word-formation, and pattern and its instantiation.

Keywords: metaphorical compounds, lexicalization, morphologicalization, mechanism, cognitive strategy, productivity

HOU Ruifen, Chinese disyllabic and trisyllabic elastic words

Chinese elastic words are words which share the same meaning but differ in word length. This is resulted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mmunication needs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The variation from short to long reflects the need of expression by means of semantic enrichment as a morphological device in Chinese. The variation from long to short, on the other hand, is an outcome of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It ensures that sufficient meaning is expressed in the shortest form and prevents word length from being extended indefinitely. This is the need of Chinese word formation as well.

Keywords: trisyllabic words, disyllabic words, flexible word length,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semantic enrichment

NING Yaoyao and WANG Mingyu,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prefixoidation with *fei* (非) in Mandarin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ansion effect in grammaticaliz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prefixoidation with *fei* (非) since the 1870s in details. It is found out that, initially influenced by translation, *fei-X* started to be analyzed as a lexical unit when occurring in parallel with *X* and *fei* functioned as the root. With the expansion of its semantic-pragmatic context, syntactic context as well as the category to which *X* may belong, *fei* underwent semantic bleaching with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and internal dependency and finally became a “prefixoid”. Translation was the trigger of the prefixoidation of *fei* while the high frequency of use in paralleled structures and the expansion of its contexts were the key conditions and necessary means of its realization. Reanalysis and analogy were also important mechanisms of the prefixoidation of *fei*.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ource and formation of Chinese affixoids.

Keywords: *fei* (非) prefixoidation, semantic bleaching, expansion, paralleled structure, translation

SONG Huaqia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Middle Chinese *shen* (深), *zhen* (臻), *zeng* (曾) and *geng* (梗) groups in southern Mandarin dialects of the Ming Dynas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vision and combination of rhymes with nasal endings in Middle Chinese *shen* (深), *zhen* (臻), *zeng* (曾) and *geng* (梗) groups in Ming Dynasty rhyme books of southern Mandarin dialect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modern pronunciations of Middle Chinese *zeng* and *geng* groups with a rounded head vowel in Mandarin dialects spoken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in Hubei, Hu'nan and Sichuan provinces, the four groups were integrated no later than mid-Ming Dynasty. However, such a merge was not attested in the Jianghuai area until late Ming Dynasty and it occurred earlier in the western Jianghuai area than in the east. In other words, the merge of Middle Chinese *shen*, *zhen*, *zeng* and *geng* groups happened earlier in the upstream stretch of the Yangtze River before it later spread into the downstream area.